



马 学 良

民族语言 教学文集



42

四川民族出版社

民族语言教学文集

马学良 编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培英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李明德

民族语言教学文集

马学良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54千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409-0088-1/H·7 定价 3.30 元

自序

这本文集是我在建国后写的有关民族语言教学、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部分论述性文章的选集。这些文章代表我30多年来在教学科研方面所走过的一段历程。

30多年来，我主要从事语言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因而文章内容也多是这方面的。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研究语言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所以也有些关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内容。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和政府在有关院校设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培养专业人材，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崭新的民族语文专业。我从解放后就厕身于民族语文教育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其间带领学生到民族地区调查实习，并参加1956年全国民族语言的普查和帮助少数民族创制与改革文字的工作。为了结合当前民族院校语文教学改革和很多少数民族为了提高文化，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迫切需要解决民族文字等问题，选入这方面的文章也较多。这类文章，都是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我的心愿，借此机会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以利于今后民族语文教学和创制文字的工作。

由于上述的原因，这本文集表现出“杂拌儿”的形式。

因此，文集收入的文章没有按文章写作年代的先后编排，原想以类相从，虽然这样做了，但性质相近的专业文章难免交错，不能截然分开。文集中的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由于有些论点长期不变，各篇内容不免有些重复，编辑时虽略加删节，但有的篇章删节后反倒损坏文章整体的系统性，独立性，因而仍保存了原貌，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同时也希望对这些旧作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展望民族语言教学科研工作，在新形势下，显示出无限光辉的前景。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继续发扬余热，为民族语文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个文集在编辑过程中，承范慧娟、李侠同志帮助抄写和校误，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1984年12月31日于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

目 录

自 序	1
语言调查常识	1
一、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者的基本要求	1
二、搜集词汇和编排词汇的方法	22
积极开展彝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	45
彝文和彝文经书	51
一部被遗忘的彝文经典——《彝文丛刻》	66
《增订彝文丛刻》序	81
彝文《劝善经》译注序	92
研究彝文古籍发扬民族文化	100
试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114
再论彝文“书同文”的问题	121
——兼论彝文的性质	
彝文经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	132
明代彝文金石文献中所见的彝族宗教信仰	144
彝族姓名考源	168
贵州省少数民族概况和创制文字问题	182
贵州省东南部苗语语音的初步比较	192
少数民族文字推行前的编译工作	216

文字推行前 教材要领先·····	226
开创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234
语言系属的研究对于帮助兄弟民族创立文字 的重要性·····	241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对于发展少数民族 文化的意义·····	246
关于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若干问题·····	249
论双语与双语教学·····	261
应该重视“双语”问题的研究·····	276
社会科学的一个崭新的学科的发生和发展·····	281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民族语文教学的情况和经验·····	284
中央民族学院黔东南苗语组在凯棠乡实习近况·····	314
关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问题·····	320
关于汉语文教学的科学化问题·····	327
努力把农民教育办好·····	331
国外汉语文教学研究见闻·····	343
要把金针度与人·····	347
马学良教授就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问题访张琨先生·····	350

语言调查常识

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者的基本要求

1. 认识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所谈的语言调查，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我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必须先要了解做这项工作的目的和要求，才能有信心地去完成这项工作。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历来就主张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早在1951年，政务院就决定了要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提出了“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努力地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和“积极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干部”。几年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其他有关机构的民族语文工作者们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曾先后组织了许多个民族语文调查队，到少数民族地区

进行调查研究，也曾帮助一些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如帮助四川彝族、广西壮族设计了初步的拼音文字方案，帮助云南傣族和其他几个民族设计了初步的文字改进方案。1955年夏天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共同组织的新疆民族语言和蒙古语族语言的两个大规模调查队，为新疆民族和蒙族文字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成绩我们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些成绩和实际上的需要是远不相称的。尤其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的今天，我们的工作就远远地落后于各民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在1955年12月举行的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各民族地区的代表，都异口同声地提出加速创立文字的问题。有的反映当地农业合作社因为找不到会计员，不得不用结绳、刻木、掐草杆、数豆粒或小石子等原始的方法来评工记分。也有的因为会计员的文化低，把“13”的数目字先写成一个“10”再写一个“3”，于是把“13”个工作日记成“103”个工作日了。因此，湘西一位苗族代表说，他来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苗族人民都高兴地以为这次中央一定会把苗文交给他们的代表带回去。可见少数民族迫切希望能早日通过自己的文字提高文化和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得到迅速的发展。因此有些代表认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前的文化工作比多开一个矿和多建一个工厂还要迫切。更困难的是有很多重要的政策法规，由于不能通过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来传达，即难以领会，也就阻碍了政策的顺利执行。如有些地区把“统购统销”认成“买进卖出”，引起农民的误会。所以列宁早就指出，“不识字的人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首先教他学文化”^①。斯大林也指出，“……千百

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进步”^②。因此，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文化是加速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民族语文工作者为了加速我国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及早地帮助各民族创立、改进或改革文字的工作。

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约有4000万，其中有2000万左右人口的少数民族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有文字而不完备。民族语文工作者必须壮大自己的队伍，加快速度进行这项重要工作。1955年12月举行的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在党和政府的指示下各地代表和语文科学工作者已经讨论了一个全面的民族语文工作规划。规定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普遍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帮助那些需要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民族进行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根据这个规划，我国各民族除极少数特殊情况以外，都得创立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了。这对于各民族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将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全部实现这个规划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相信民族语文工作者面对这个艰巨而迫切的工作，一定能尽一切的力量，保证顺利地完 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如上所述，创立、改进和改革各民族的文字既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件细致的科学工作。要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这就必须提高民族语文工作者的政治和业务水平，所以在这次开展民族语文调查工作之前，先开办一个训练班，就是为了提高所有参加调查工作人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虽然学习时期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语言学专家

的指导下，以及同志们的热情学习，我们按照紧凑而严密的
教学计划去进行，努力学习语言科学的理论，相信每个人都
能在这较短的时期内，把自己锻炼成少数民族语文调查研究
战线上一个英勇的战士，来迎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任
务。

2.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者 应具有的科学知识

(1) 语音学的基本知识

我们知道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要想帮助一个民族解
决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就必须先对这一民族的语
言作一番彻底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它的音位系统，才能按音
位制定文字符号。惟有真实地代表音位的文字，才能符合广
大人民的需要。所以在制定文字之前，科学地分析研究语言
的构造是语文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我们也知道语音是语言的
物质外壳，所以研究语言就必需先从语音着手，因此语音学
就成为语言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

语音学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一种语言或一般语言的声音
系统和变化规律，并训练人们学会听音、辨音、发音、记音
的技术的科学。也可以说，语音学是研究音素的发生、类
别、变化、音势的强弱轻重，和音调的高低抑扬的一种科
学，它是就构成语言的材料一方面来研究语言的。”^①我们在
过去的语音学课堂上，大家都学习过这些语音学的基本知识，
但现在就要应用这些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我们应当重温旧
课，有哪些理论知识还不够明确，或不甚巩固，尤其在实践
面前，能否运用自如，这就需要我们要及早检查，如听音、辨

音能否达到准确，分析音素及处理音变的技术是否纯熟，如果发现有不了解的地方，需要进行补习，必须能够彻底地了解，才能担负语言调查的工作。

调查语言，必须掌握一套能正确代表语音的记音符号，我们通常使用国际音标来记音，必须能熟练运用，能做到听得准记得正，还要把每个音标能够正确的发出它的音值，即所谓耳熟、口熟和手熟。练习音标的方法，最好能通过具体的语言去练习，更能扩大到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的语音。如拿苗语练习，我们可以把苗语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方言都一一练习，甚至有些土语的个别语音上的差异，也要学习，因此可以增加很多新的语音知识，将来碰到跟这有关的语音就可以熟练地记录下来。我们准备从各语系的语言里选出代表的音值，让同志们去练习，希望组织起来多听多记，这样可以加速提高听音和记音的能力。

(2) 语法学和词汇学的基本知识

我们过去对语言学的研究，一般地是偏重在语音，而忽略了语法和词汇的研究，往往只根据语音上的差异去区别语言的系属和划分方言。斯大林指示我们说，“语言的文法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④，我们调查研究语言时，必须具有研究分析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能力，对于我们划分方言土语或亲属语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苏联顾问谢尔久琴柯教授经常提出我们应注意这一点，他在汉语标准语规范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则的报告中指出，“方言之间的差别，除表现在语音上，也可以表现在语法和基本词汇上……因为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仍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语言的特性的本质，所以在研究方言和划

分方言的时候，除语音现象之外，应该特别注意所研究的或所对照的那些方言之中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特殊现象”。最后他强调指出我们今后研究方言的方法说，“因此，把全部精力放在确立小方言或方言语音特点的那种研究方言的旧方法，目前应彻底改变”。这些重要的指示，我们在选择壮语基础方言和1955年在苗语、蒙古语族及新疆各族语言的调查报告中都曾注意到这一方面，希望今后的调查工作，更应加强语法和词汇的研究

(3) 研读语言学专著

语言工作者除了在课堂上听讲外，重要的还应当自学，首先是选读专家们所研究的各民族语言的专著，看他们如何分析一个语言的语音及语法结构，如何记录词汇及排列词汇等技术方面的成就，这就可以丰富我们研究语言的经验。我们有些同志是这方面的懒汉，他们不肯这样做，因此有的只学了些空洞的理论知识，一与实际接触，就感到束手无策，其实前人的著作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样处理音系，怎样分析语法，和怎样安排词汇等，但是这些人却熟视无睹，不用心学习，这是一种类型；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也曾翻阅了一些书，但只是浮光掠影地一目数行，钻研不下去，就“掩卷长叹”，视为“天书”，从此不再接触了，这又是一种类型；更有这样一个人，目空一切，对专家的著作评头品脚，只看缺点，不见优点，甚至大叫“这样的著作，我也能写出来！”可是自己一接触语言，就无从下手，这种眼高手低，不可一世的骄傲态度就阻碍了他的进步。这三种学习语言科学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们今后的学习态度，是虚心听讲，耐心钻研专著，学习老专家的长处，从专著中吸取经验和方

法，同时结合自己所学习的语言，运用这些方法去分析研究。我们准备选一些有关研究语言方法的专著，给同志们学习，同时着重在对一种语言的实习工作，希望大家都能切实地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地去研究。

(4) 其它科学知识

有人以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不必通晓其它科学，只要把研究语言的一套技术学习好，就可以处理语言，写出报告。我们知道，“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0页）。苏联语言学家契科巴瓦说：语言为社会服务，所以，它反映该社会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这就决定了语言学和各社会——历史科学（和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等）的关系（《语言学概论》第一编，234页），所以我们对使用这个语言的人民历史，社会情况不熟悉就很难研究他的语言，举一个例子来说，如彝语 p'aɿ 是肩胛骨卜，ɣaɿ byɿ 是鸡卦卜，ŋk'vɿ 是一种祭记插枝叶代表神座的仪式，如果不明了彝族的宗教制度，就无法深入了解这些词的涵义。又如 ɕeɿ 是彝族婚嫁时缝制的一种“裙子”，如果不明了他们的婚礼，就会用错了这个词的意义。诸如此类，都必须彻底了解社会情况，才能了解他的语言现象。又如我们研究人文学，可以帮助我们觉察到方言的差别，C.C. 维索特斯基在《研究方言的方法》中指示我们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说，“在乌拉基米尔省的边缘，o 化和 a 化的俄语方言之间的界限相当于前妇女的特种服装分布界限，特别是，象当地老住户直接指出的，北方穿 сарафан（农村妇女的一种没有袖子的有带子的长衫）而南方穿 понева（农村

妇女穿的一种有褶裥的短裙。) ”^⑤在使材料系统化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过程中，对地方上各种情况很有研究的人能给予很大的帮助。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各民族地区里常见到，如四川境内的彝语有圣尔、义诺、所地三种方言区的彝族服装，恰好有宽裤脚、中裤脚、窄裤脚等服装上的区别。苗语的方言土语也有很多地区跟妇女的服装颜色及饰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些人文方面的特点，对于帮助我们划分方言土语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历史的研究对于帮助解决语言上的问题更加重要，语言的发展与人民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由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部族语言和形成的民族语言，离开了社会发展史去孤立地研究语言是徒劳无功的。苏联方言学家 P.N. 阿瓦涅索夫在论俄语方言地图一文中说，“我们给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克罗门地方找到了另外的根据。在过去这也是土雅蒂其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里亚桑公国的一部分。但是早先（1301年）它是属于莫斯科的。很有意思的是克罗门地方有一些语言现象接近于里亚桑人的西南方，而另一些现象则接近于北方。有一些语言现象把这块地区分为两种，这使我们能够推测，一些方言上的特点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显然已经存在了。这样看来，已有的历史地理学能够帮助我们推定语言现象的正确无疑的年代^⑥，我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也是交错着，尤其在借词里更显示出这些民族在历史上的关系，如有些民族在名称上虽然现在不同了，却共同使用着同样的语言，这就需要靠历史的研究帮助解决的问题，所以每种方言分布的领域和个别语言现象流行的区域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归根结底，是受社会历史，社会的经济、政治和

文化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依据斯大林的指示，我们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①。

有时方言的差别也反映在民间口头文学的谚语、歌谣和神话故事中。如在苗语地区中有很多词甚至语法构造，在甲地方言中没有，而在乙地的口头文学中还流传着；也有一些词在乙地只限于口头文学中使用，而在甲地却仍然习用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中。这种方言的差异，只有广泛地收集民间文学材料才能进行研究。在有文字的民族的文献里也常保存着方言上的特点，如现代喀尔喀等语中的 ай, ой 相当于旧蒙文的 ай, и, ай 如

喀尔喀	旧蒙文
айлмлах	ajilgilaxu 作客
хоо-ой	xojo lai 喉咙
дайлах	daji laxu 作战

因此在文献中也可以发现比较正确地肯定了方言特点及其地理分布情况。

但是运用文献原文去研究方言，我们应特别慎重，著名的俄语方言学家 С.С. 维索特斯基教授说：“民间创作的文献需要慎重地处理。因为，大家知道，民间创作的语言，并不是方言学家首先应该处理的严格地地方化了的现象。民间创作里所见的方言形式，有时候是记录这一作品的人的方言里绝对没有。而是属于另一种方言的。这些特征在这里只能按照传统来用，而且决定于作品的风格（例如 词里重音位置的变动）。”^②这段话指出民间创作原文所有的特殊复杂性，因为忽视这一点便会对所研究的方言结构树立一个不正确的观

念。C.C.维索特斯基继续说：“所以，研究者在描写一种方言的时候应当首先而且主要依靠的不是从民间创作中得来的资料（这只能作为辅助的材料来利用），而是活的口语材料。”③

3. 作好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语言调查是一件艰巨而细致的工作，除了上述调查者应具有的基本知识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需要制订收集材料的大纲。过去语言调查者对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做的不够，有的只有一个简单的词汇表或若干收集句子的表格，但往往各行其是，同一语言的调查者而所用的大纲都不一致，因此收集来的材料无法进行比较研究。自从1955年组织了新疆民族和蒙古语族两个语言调查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才有比较详细的调查大纲，并且批判了过去语言调查时所制订的调查表格只偏重在语音而忽略语法和词汇的缺点。如谢尔久琴柯教授所说的“方言调查表格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但要涉及语音研究，而且也要涉及语法和词汇”④。这是很正确的。这两个调查队就是根据专家的指示来制订调查大纲，并经过所有参加调查的人员讨论和学习，所以虽然在较短的调查期间还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因此，制订收集方言材料的大纲是方言调查研究的首要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调查大纲的范围是以收集包括方言的各种现象的方言材料这一任务决定的。要使得以后大纲中问题的答案有可能对所研究的方言系统有一个完整概念，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有可能来解决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及其标准音的问题。因此在大纲中主要是采取问题集的方式，如各